

张
鸿
魁

金瓶梅语音研究

齐
鲁
书
社

王 序

从语言学角度看,《金瓶梅词话》是一部生动鲜活的语言资料库。由于《金瓶梅词话》独特的写实风格,使人物的言语风貌、生活场景特别贴近生活。人物对话、谐音故事、谐音歇后语取材于当时特定方言区,拟声绘形,口语资料尤为丰富多彩。

但是,对《金瓶梅词话》从语言学角度的研究,特别是对《金瓶梅词话》语音的研究,是“金学”中相当薄弱的一环。张鸿魁同志的《金瓶梅语音研究》,在这方面填补了研究的空白,开拓了“金学”的新领域。鸿魁同志有深厚的语言学素养和方言调查经验。早在八十年代初,鸿魁同志用了三年时间对临清方言进行调查,撰写出版了《临清方言志》。这一研究成果,给《金瓶梅词话》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,提供了首选参照系。

《金瓶梅语音研究》以艰难的语音研究为重点,从《金瓶梅词话》开掘语言材料:谐音名称 21 例;谐音故事 8 例;谐音歇后语 33 例;新造形声字 38 例;异形词 112 例;同音替代字 100 例;诗词曲用韵 370 例;文谣用韵约 120 例。在丰富的材料基础上,从韵、声、调、轻音、儿化方面对《金瓶梅词话》语音系统进行分析。从《金瓶梅词话》语音系统的客观事实出发找出特点,规律,从而得出结论:《金瓶梅词话》的语言反映了当时鲁西方言的特点,判定《金瓶梅词

话》作者即使不是山东人，也应长期在山东生活，熟悉山东特别是鲁西临清一带的语言。这一结论不是直感的印象式的，而是经过严密地科学地论证后得出的，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。

《金瓶梅语音研究》的出版，将会促进《金瓶梅词话》的进一步整理校勘，将会帮助读者对文本的阅读鉴赏，将会推进近代汉语的研究。祝贺鸿魁同志为《金瓶梅》语言研究作出的新贡献！

王 汝 梅

于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

《金瓶梅》研究室

1995年12月

李 序

《金瓶梅》的语言问题，本来是从作者籍贯引起的。几乎所有论者都从考察词汇入手。某些词见于山东，所以作者是山东人；有些词见于杭州，于是作者又成了吴人；可是，有些词又见于兰州、见于昆明或者见于其它什么地方，那又该怎么说呢。语言学界有一句很出名的话：说“有”易，说“无”难。词汇的扩散能力很强，其分布范围很难界定，在没有对全国方言作穷尽性调整查之前，实在不敢断言某词只出现在甲地，而不出现在乙地。“杓子”一词，大家以为只可能出现在南方，因为这是吴人习用的器具，山东是不会有有的。这为作者吴人说提供了一条无可辩驳的证据。不料一位先生在山东临清一带作了深入调查，证明临清地区从前确有“杓子”存在，几十年以前，女儿出嫁，娘家要陪送杓子。这反为作者鲁人说增加了一条例证。争来争去，大家似乎看到，仅仅根据词汇，很难说明问题，应当另辟蹊径。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”。方言语音比较稳定，不同方言之间，语音的区别特征比较明显，至少大方言区之间不至于混淆。有感于此，张鸿魁先生作《〈金瓶梅〉的方音特点》，认为“-m尾韵并入-n尾韵；入声韵脱落辅音韵尾；浊音声母的清化；舌面音声母的产生；全浊上声变去声”等现象，“肯定为《金瓶梅》作者方音，而不传

刻者方音”。又说：“《金瓶梅》首先是在吴中‘悬之国门’的，万历丁巳本《词话》也是在吴中初刻的，既然《金瓶梅》早期流传经过了众多吴人之手，出现一些吴音错讹就不足为怪”。文章在《中国语文》上刊布，吴晓玲先生阅后，寓书作者，赏誉有加。不料鸿魁先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从音韵入手，对《金瓶梅》的语言展开了全面分析，于是便有了我们面前的这部《〈金瓶梅〉语音研究》。

确切地讲，这是一部专书音韵研究。书中的具体结论，自然颇多精彩之处，窃以为更有意义的倒在于作者为近代语音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。

上古无韵书，研究上古语音不得不依赖韵语、谐声、经典异文、假借、异读、读若等等材料。依靠这些材料，经过清人和近人的不断努力，上古语音的音类系统大体已经清楚。中古有《切韵》一系的韵书和《韵镜》一类的等韵图；近代以来，自《中原音韵》之后，各种韵书和等韵图更是异彩纷呈。有了这许多现成的音系材料，研究者的注意力，除有时通过作诗词韵谱以窥测唐宋韵部演变之外，几乎全部集中在韵书和等韵图上，对于散见材料，似乎很少留意。但是，韵书和等韵图有两个缺点：其一是综合性，虽然都带有各自的方音特点，却又尽量吸收他处的一些成分，以期“共守天下之音”；其二是因袭性，实际语音已经发生变化，韵书作者还在因袭着某些旧成分，最显著的例子是入声问题。在北方官话中，入声韵尾的合并与脱落，早在宋代已经开始，到元明时期，入声韵已经变为舒声韵，但在明清北音韵书和等韵图中，入声往往是单列的，

明初的《韵略易通》如此，明末的《韵略汇通》也如此，直至十八世纪山东掖县人周云炽的《韵略新抄便览》仍然如此。由此可知，韵书和韵图可能掩盖了不少语音事实。

王了一先生晚年作《汉语语音史》，用朱熹《诗集传》和《楚辞集注》的反切代表宋代语音，得出了很大胆的结论。王先生的具体结论，当然尚有可议之处，而王先生所走的路却告诉我们，研究中古和近代语音，除了注意韵书韵图之外，还要留心非语言学著作中的语音材料，这些材料，往往能够很自然地透露出一些最新的语音变化。鸿魁先生的《〈金瓶梅〉语音研究》，运用非音韵学材料，揭示了大量新的语音变化，构拟出一个近乎完整的语音系统，是一次成功的尝试。且举一例：

现代汉语音声母 j [tɕ]、 q [tɕʰ]、 x [ɕ] 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这里有两个问题，其一，舌根音声母 [k]、[kʰ]、[x] 是何时腭化为 [tɕ]、[tɕʰ]、[ɕ] 的？其二，舌尖前音声母 [ts] [tsʰ]、[s] 的细音字是何时并入舌面前音的？这些问题，明清韵书和等韵图始终没有正面记载，只有偶尔从侧面透露出一点迹象。如：明隆庆年间本《韵略易通》有歌诀曰：“见溪若无精清取，审心不见晓匣跟。”似乎说明，见 [k]、溪 [kʰ]、晓 [x] 母的细音，已经与精 [ts]、清 [tsʰ] 心 [s] 的细音合并，如果合二而一，其读音一定是舌面前音，可惜没有更多的证据。《〈金瓶梅〉语音研究》用大量的谐音和异文材料证明了舌面前音的产生和尖团音的合并。作者首先举出贤/闲、刑/行等谐音材料和见/间、叫/教等异文材料，证明喉牙音的开口二等跟三四等韵不分，从而推断：

《金瓶梅》方音已经具有舌面前音声母。然后，排比哇/席、晓/消等谐音材料和向/相、近/进、去/取等异文、假借材料，证明齿头音声母三四等字跟喉牙音声母的细音已经合成一类，依照语音的一般规律，合并后的音值应当是舌面前音。这一结论，与隆庆(1567—1572)本《韵略易通》所载歌诀可以相互印证。就我所知，这是论证舌面前音出现时代的最系统的文献。

清儒王念孙在《广雅疏证·序》里说：“诂训之旨，本于声音。故有声同字异……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，引申触类，不限形体。”因声求义，已经是训诂学的基本原则。可惜这一原则只运用于先秦两汉词语的训释，至于六朝以来的口语作品和俗文学中的语词训释，似乎仍旧沿用会同比较的办法，没有打破字形的限制，望文生义的情况时有发生。俗文学之所以为俗的一条重要标志，就是它使用当时的口语词。口语词往往有音无字，只能用同音字替代，这其实是新时期的通假字。研究古字通假，要明古音；研究近代通假字，不仅要通晓近代语音，还要有方言学的基础，懂得方言读音。“撮着行房”谐“缺着刑房”，“撮(jue)”，在山东方言中读 que，与“缺”同音，其意为“折”，折之使断、折之使弯、折叠，都可以用“撮”。

清代朴学家论治学有三难：淹博难、精审难、识断难。专书语言研究，淹博与精审固然非常要紧且十分不易，但更要紧和更难的恐怕是识断。有些材料，表面看来似乎无法理解，一经深入分析，便会豁然顺适。“抬放”不词，作者先论“抬”为“襁”之简字，次论“抬”为“招”之形讹字，再论

“招”为“着”的同音假借字，原来“抬放”就是“着放”，意为容纳、收受、安置。此类例证很多，如果不能从音韵、文字、训诂、方言多方面综合思考，很难有这些精彩的判断。

此书重点揭示《金瓶梅》的音韵系统，兼及词汇和文字，我们很想看到专书词汇和专书文字研究，希望魁先生别让我们等得太久。

李 行 杰

一九九六年六月于青岛靠山楼

目 录

王 序

李 序

绪 言

- 第一节 金瓶梅的语言价值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二节 专书语音研究的必要性…………… (3)
- 第三节 金瓶梅的语音研究…………… (5)
-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引用书目…………… (7)

第一章 语音材料的开掘

- 第一节 谐音说…………… (12)
- 第二节 俗字辨…………… (37)
- 第三节 韵语论…………… (80)

第二章 用韵研究

- 第一节 研究方法和用韵概况…………… (101)
- 第二节 词曲用韵…………… (104)
- 第三节 诗歌用韵…………… (131)
- 第四节 文谣用韵…………… (147)

第三章 语音特点分析

- 第一节 入声辅尾的消失…………… (157)
- 第二节 m 尾 n 尾的合并…………… (167)
- 第三节 ng 尾的独立性…………… (169)
- 第四节 二等韵的分化和
齐齿呼的形成…………… (172)

第五节	ü 韵母的产生和撮口呼的形成·····	(175)
第六节	三等韵知系字的变化·····	(177)
第七节	齐微分韵和重组唇音字·····	(180)
第八节	歌戈韵的圆唇趋势·····	(183)
第九节	皆来韵有齐齿呼·····	(185)
第十节	萧豪和尤候的混淆·····	(186)
第十一节	浊音声母的清化·····	(187)
第十二节	舌面声母的产生·····	(190)
第十三节	疑母微母的消失·····	(192)
第十四节	唇齿擦者只拼合口呼·····	(195)
第十五节	前后舌尖声母的混淆·····	(197)
	附:声韵关系配合表·····	(200)
第十六节	入声字调的分派·····	(202)
第十七节	古上声字的声调分派·····	(203)
第十八节	阴平和上声的混淆·····	(206)
第十九节	轻音的发展·····	(208)
第二十节	儿音节和儿化韵·····	(212)
	附录:金瓶梅词话字音全表·····	(216)
	后记·····	(340)

绪 言

第一节 金瓶梅的语言价值

《金瓶梅》是一部划时代的文学巨著，也是一个空前规模的语言资料宝库。

文学史家看重它的艺术成就。它是传世的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，是反映平民生活的风俗画卷，而且是构思完整、描绘细致的作家独立创作的真正艺术品。

对于同一种现象，从另一个角度去看，也应该高度评价。汉语史家从“风俗画卷”看到了语言材料的丰富多彩，从“独立创作”看到了语言资料的统一均匀。

一部百万字的宏篇巨制，写到了八百多各色各样人物的言谈举止，而且主要人物都属于市井细民，衣食住行，百态毕具。语言资料，特别是口语资料的丰富，是前此任何文献都无法比拟的。

而且，整部小说基本上成于一人之手，写作时代稳定明确，这又比各种文集语录的语言性质单纯得多。特别是中国和日本都发现了明代刻本《金瓶梅词话》，这种早期刻本未经后人过多的改篡，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作品朴拙真实的语言面貌。这样的语言资料实在是不可多得的，它相当全面地反映了特定语言的语音、词汇、语法现象。

《金瓶梅词话》反映的是什么时代什么地域的语言呢？

在时代上没有太大的疑问。尽管对小说的创作时间有各种推

测,但都不出明代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近百年的范围。可以肯定地说,它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的一种语言的面貌。

在地域上认识也渐趋一致,是一种北方话,只是词汇方面吸取了当时吴语的某些成分。

见过早期抄本、熟悉初刻情况的沈德符,有一段话很有影响。

……无几,则吴中悬之国门矣。然原本实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,陋儒补以入刻,无论肤浅鄙俚,时作吴语,即前后血脉,亦绝不贯穿,一见知其贗作矣。(《万历野获编·词曲·金瓶梅》)

沈德符的话告诉我们,除了补写的53—57回里偶有吴语成分(“时作”不是“多作”)以外,他见到的手抄本和初刻本是没有吴语的。是用什么话写的呢,他没明说。但是,既然他指吴语为鄙俚,当然视原作为典雅,那就只能是明代的官话,亦即北方话。

沈德符是秀水人,即今日浙江嘉兴一带的人,是地道的吴人。所以,他判定原作不是吴语。这个结论是有关权威性的。

《金瓶梅》是用北方话写的,可以说是古今基本一致的看法了。

但是文学史家和语言史家都不肯就此为止,因为北方话太笼统了,包括了大半个中国。要缩小所指的范围,争论就又大了。

势力较强的一派,应该是“山东话”说。

《金瓶梅》问世百余年后,陈相为张竹坡评点本《金瓶梅》作跋,认为《金瓶梅》有山东土白。近代的郑振鐸、鲁迅、吴晗,也都认为用的山东话。他们都没有就此作严密的论证,大概是凭一种直感。

这种直感很该重视。因为:第一,这些人都不是山东人,并无乡土偏见;第二,这些人也不是专门的语言学家,却有着共同的一种综合印象。

从语言学角度看,确定语言的性质,应当凭据语言事实的归纳,凭借语言之间的比较。比较需要有参照物。

山东话自然是参照物的首选代表。大家都知道,《金瓶梅》拟置的地理环境是山东清河、临清(现在清河划归河北,仍属临清邻

县)；现存词话本署名作者笑笑生，前署籍贯为“兰陵”，即今天的山东枣庄市东部(不太可能是南兰陵武进)。仅据这些是不够的，但近几年的研究成果，有两点很发人深思。其一，小说中提到的临清、清河的地名地物，多数为临清历史上实有，不少至今犹存。其二，小说人物中山东地方官吏，凡明代史料可查实有其人的，多数确是山东籍或有在山东为官的经历。

因此，判定《金瓶梅》作者即使不是山东人，也应长期在山东生活，熟悉山东特别是鲁西临清一带的地理风俗语言，这不能算妄加猜测。

如果《金瓶梅》的语言反映了当时鲁西方言的特点，它也不会跟四百年以后的现代鲁西方言完全一致。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。

第二节 专书语音研究的必要性

什么原因促使我对《金瓶梅》的语音作专门的研究呢？主要有两方面。

第一，汉语史的研究近十余年有很大发展。特别是，对于专书语言研究这种基础工作的重要性，已渐形成共识。研究专书词汇、专书语法的论著已有很多。相比之下，专书语音研究文章却很少，对专书进行声韵调系统研究的论著，更有待于方来。

第二，语音、词汇、语法的发展是相伴相生的，三方面的研究也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。但就目下而论，语音研究的薄弱，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词汇语法研究深入发展的障碍。对一个时代、一部书语音面貌的模糊认识，常导致词语、语法认识的失误。(这种形势在近代汉语研究中尤其突出)。

我们可从《金瓶梅词话》中选些例子，说明语音认识的作用。

“招放、照放、抬放”一组词语。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个时代的语

音系统中已经没有入声，不了解容纳义的“着”已跟“招”读音相同，对上述几个词语的词义和语法构成就难以正确认识。了解了语音特点，就会知道，“着放”是个并列结构的词，意思是“容纳”；而“招、照”只是“着”的同者替代字，“抬”又是招字的讹错。

“扛”在《金瓶梅》中多次当“用言语顶撞”讲。如果我们知道，早在宋代“工”声符字(江摄)跟“亢”声符字(宕摄)已经韵母相同，许多方言中“扛”跟“抗”声调相同，表示的是同一个词，就可从理清这组词的词义引申的脉络：用肩承担—用肩头撞—用言语顶撞。

专书语音研究为什么难以开展，这显然跟汉字特点有关。

历史上的语言情况，凭借书面资料得以保存。汉语历史资料是用方块汉字记录的。

文字都是以形体通过语音去表达语义的。但是汉字不是拼音文字，难以据字形得出正确的读音认识。这种字形和音义脱节的现象，在近代汉语资料中尤为突出。

面对近代汉语书面资料，我们从字形或字义两方面去推知字音都遇到新的困难，缺乏有力的直接工具。

从字形来说，近代出现了大量的新形体。笔划的省简，草楷转换的变形，造成了一些新字，难以据旧字书去确认。新形声字也已经打乱了《说文解字》的谐声系统，甚至反映中古音的《切韵》也帮不上忙。

从字义来说，近代出现了大量的新词语。从外族语或方言借入的词语，不符合传统的构词法，有的只是音译记字，我们无法据旧字书规范的字义去认知。据方音借字记词方法的大量运用，使一些本不新鲜的词语也改换了面貌，导致误解。这个时期的文献，总的说来尚缺乏严谨的传注资料，对词义的认识多有模糊不确之处。

据书面资料去研究语言，还有一个颇为棘手的字形讹误问题。例如上文说过的《金瓶梅》“扛”一词，又写作“扛、证、相、像”，从字形上，从字义上，都很难发现它们跟“kāng”音有什么关联。这牵涉

到诸多问题：构字规律（更换形符“扛～江”），草楷转换（形近误写“江～证”“扛～相”），繁简转换（“证～證”），同音替代（“相～像”）。我们把这种曲折的变化称为“辗转讹变”。前文提到的“招放”一组词形，“着～招～抬～擡”的变化也是辗转讹变。近代汉语资料中，这种辗转讹变现象并不罕见。不作必要的校勘，表面化地利用来研究语言就会造成失误，来研究语音就更危险。

对专书进行语音研究，是十分必要的，也是相当困难的。

第三节 《金瓶梅》的语音研究

一、《金瓶梅》语音的系统性

我们说的《金瓶梅》的语音系统，大致是指其作者的方言音系。任何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系统。跟词汇系统、语法系统比较，语音系统更有稳定性。它必须以一个具体方言音系为标准，声类、韵类、调类有数，结构关系明确。

有人认为，《金瓶梅》是集体创作，而且可能作者们不是操同一种方言。

但是，即使特“集体创作”说的人，也总承认有一个“写定者”或统一全书文字的“主编”。《金瓶梅》毕竟不是论文集，而是情节结构完整、血脉贯通的一部小说。这个写定者或主编总不会南腔北调，应该有自己的方音习惯，有稳定明确的语音系统。

不能不承认，《金瓶梅》在抄刻流传过程中，会有书手刻工的有意改补或无意讹夺，这给小说语言造成了一定的混乱。但是，只要我们详加校勘，这些问题可以逐步认识纠正。而且，从总体上把握语音系统的框架，又是校勘的有力工具。讹误再多，也不至于遮蔽了总体框架。

我们认为,金瓶梅的语音系统是客观存在的,认识它是完全可能的。

二、研究金瓶梅语音的条件

跟其他近代文献资料相比,《金瓶梅》更适于作语音研究对象。

第一,本身有可供语音研究的丰富材料。材料可分为三类。

1、谐音双关材料,包括谐音姓名、谐音故事和谐音歇后语。它们可以准确地反映词语之间的同音关系。《金瓶梅》描写的是商业兴盛带来的城市风情和市民情趣,这类谐音材料随处可见。

2、韵语,包括清唱词曲、证词 600 首以上,还有大量话跃在人物口头上的押韵谣谚,它们可以集中地反映韵母系统,其中谣谚更能反映口语的语音情况。

3、俗字,包括同音替代字和新造形声字。《金瓶梅》作为通俗文学作品,用字不求规范,同一词语常写作不同的字形。大量的俗字给考察词义带来了困难,也给考察字音带来了机会。只要根据语境或比照其他文献弄通了词义字义,就可以跟通用字形(本字、正字)比较,从同音字的选择、新字声符的选择考见音类的变化规律。

第二,校刊训诂成果相对丰富。跟其他近代文献相比,《金瓶梅》以其文学价值得到世人特别的青睐,问世以来就有赏析评论文字。本世纪 30 年代词话本发现并刊布以后,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,对其作研究的日见其多。研究成果中包含不少校刊训诂内容,足资语音研究的参考。

第三,《金瓶梅》语言的时代地域比较确定,同期有各类字书辞书可作参照。象梅膺祚《字汇》对俗字的注音释义,毕拱辰《韵略汇通》对官话语音系统的分析,都可以提供切近的参考。又因为《金瓶梅》去今未远,现代北方方言,特别是鲁西临清一带的语音现状,也可以作重要的直观参照物。

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引用书目

一、研究方法

语音研究离不开历时和共时的比较。

我们的基本方法是：整理材料，理清《金瓶梅》中字与字之间的同音关系、押韵关系；跟《切韵》《中原音韵》反映的语音系统比较音类的分合，构制《金瓶梅》声韵调系统的框架；参考现代临清方音和《韵略汇通》，确定音值和声韵拼合关系；依照现代方音推测当时的轻声、儿化等音变现象。

为了表述成果，便于普通读者理解和运用，注音方式一般采用《汉语拼音方案》规定的声韵调符号。《金瓶梅》语音跟现代北京音在系统上有不同之处，我们采用变通的方法处理。如：《金瓶梅》时代有一类韵母，相当于 ai 的开口呼，我们记作 iai；那时 zh、ch、sh 可以跟 ü 韵母拼合，我们记作 zhü、chü、shü。

二、《韵略汇通》简介

《韵略汇通》，明朝末年山东掖县（今莱州市）人毕拱辰著。据作者在崇祯十五年写的序言，此书是在《韵略易通》宿度刻本的基础上，“增册分合”改编而成。《韵略易通》的作者兰延秀是云南人，而其书当时有“山东韵略”之称。宿度也是山东掖县人，是毕拱辰的同乡前辈。毕拱辰本人经历很简单，据山东、山西的地方志书记载，他在家乡读书中举，中进士后在山西作了几年官，在与李自成农民军作战中被杀。

《韵略汇通》反映的应该是山东一带的官话方言情况。根据韵书反映语音只能滞后不能超前的规律，《韵略汇通》的声韵分类反